

打通农业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

丁琳琳

光明论坛
中国新闻奖专栏

评论版投稿邮箱
gmpinglun@163.com

“强化农业技术和装备支撑”“建设智慧农业”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明确要求。农业技术转移作为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最后一公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成效,对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15年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农业技术转移向需求导向转变,让市场在我国农业技术转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业科技创新主体的技术转移活力,促进了农业技术成果的转移扩散。总体上看,改革主要集中于扩大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方面,但在扩大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需求、形成农业科技成果供需有效衔接两个方面方面的改革进展还不。2014年至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54.8%下降到46.57%,令人忧虑。另外,我国农业对科技成果的需求量在众多行业中排名第三,而现代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支撑力度明显不够,制约了科技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推进,这迫切需要深化改革、优化调整农业技术转移体系和机制,使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在形成、改造农业技术转移机制、促进发挥市场作用方面经验丰富。它们普遍从市场和政府、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入手,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农业技术转移中的分工协作、有效互动、利益共享,以此高效地联结和满足农业科技研发与农业发展、农业经营者的需求。改革通常由政府主导,在扩大农业技术有效供给方面,政府着力促进农业技术供给由政府垄断走向多元化、商业化和私有化;在培育农业技术有效需求、改善农业技术供需衔接方面,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农业技术需求方的认知和判断力,增加农业技术市场需求;在改进农业技术转移管理方面,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突出宏观规划与计划的针对性,营造符合农业技术转移机制改革要求的保障性条件和外部支撑环境。

在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背景下,加快提高农业技术转移效率,解决农业问题,促进农村发展,加强科技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支撑,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结合我国农业发展规律、农业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规律,从以下方面着手优化调整我国农业技术转移机制。

培育发展多种农业技术转移机构,政府主导公益性农业技术转移、市场引导营利性农业技术转移两条线并重。营利性农业技术转移中介机构以大学和科研院所内部技术转移机构为主体,农业行业中5%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从事新技术开发,30%的企业从事技术改造和技术市场开发。

构建政府投入稳定、市场投入增加、政府和市场投入各有侧重的农业技术转移投入支持机制。中央政府投资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补贴知识和技术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时发生的基本的技术转移费用,并向东北和西部倾斜。地方政府按问题导向和技术需求指向投资地方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开发前瞻性的农业应用技术,推广有产业共性的农业应用技术和。发挥企业优势,让市场集中投资农业技术市场潜力大、容易商业化、适用性强的成熟技术,提高技术创新和转移扩散的效率与效益。

健全农业技术供给体系和机制,增加适用性农业技术供应。科学规划布局农业科技孵化器,加大财政资金专项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在打破部门利益藩篱、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让渡政府资助产生的农业技术产权,促进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与市场的合作,增加社会项目占比,加快产生符合市场和农业发展战略需求的新技术;实施“工读交替制”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农业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培养水平;改进农业技术转移专业人才的激励、评定机制,壮大、稳定农业技术转移人员队伍。

培育农业技术转移市场需求。推广普及农业教育,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科学技术素质;推广规范性合同或协议,规范第三方农业技术评价和价值评估工作,降低农业从业者采用农业新技术的风险;丰富农业技术转移平台和中介机构优势,调研挖掘农业技术需求;将农业技术需求和农业技术成果信息纳入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

以解决资金和人才问题为主,完善支撑保障性环境。构建“政产学研服”模式的农业技术转移体系,对涉农企业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认定的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上缴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实行部分减免;设置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财政专项扶持资金。此外,把农业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培养纳入人才政策范畴。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杜绝拒诊是精准防控应有之义

23日下午,在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针对部分医疗机构拒诊中高风险地区来京就医患者的现象,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表示,已对相关区卫生健康委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医疗机构对存在的问题立即立改,杜绝拒诊问题再次发生。

医疗机构是防范疫情扩散的重中之重。医院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完全必要。而由此带来的一些不便,患者也应该理解配合。但是,新冠肺炎是病,其他的病也是病。尤其一些危重症患者,相关治疗同样刻不容缓。医疗机构不能因为防控压力大,就简单地将中高风险地区的患者,甚至只是中风险城市相邻地区的患者拒之门外。一些兼顾得比较好的医疗机构,为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患者辟出了专区接诊,

有一套比较规范的接诊流程,既精准防控,又不耽误患者病情。不过,应对疫情带来的特殊就医难题,压力也不能由医疗机构一家扛。相关部门要切实共同落实配套政策措施,部门间要协同配合,共同做好患者救治工作。医疗机构核心力量要敢于接诊,让医疗机构核心力量敢于接诊。人。比如,相关部门不妨与医疗机构实行精准信息共享,为其判断患者风险级别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依据。这也全国而言,则应顺势进一步,推动大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与各地医院对接互动,通过远程医疗等现代手段解决难题。

(原载于新华社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 作者:尹平平 摘编:王晋)



“第一学历偏好”还能破除吗

严飞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来,有关“第一学历偏好”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所谓“第一学历偏好”,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一些用人单位将求职者的第一学历毕业院校是否属于“双一流”或者“985”“211”高校作为筛选门槛的现象。在这一偏好下,一些第一学历为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尽管拥有更符合招聘要求的专业技能、更加丰富的实习经历,甚至他们的硕士、博士深造学历属于“双一流”高校,却可能连招聘的门槛都无法达到。这种“学历查三代”的倾向造成了一种困境:占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被压缩的求职空间,继而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焦虑。

从企业的立场来看,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于高质量人力资源需求旺盛的环境下,第一学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高效地筛选出更具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度的毕业生,尽管这样简单粗暴的甄选方式可能会漏掉普通院校中的佼佼者。但另一方面,

行业和企业却很少能够真正去思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专业技术扎实的,还是长于沟通协作的,抑或是富有创造力的?最终只能笼统地将“双一流”高校作为选拔的主要标准。所以,一定程度上,“第一学历偏好”就是人力资源的“面子工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第一学历偏好”这一简单规则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美国学者劳伦·里布拉揭露了美国的企业招聘中弥漫的一种“名校情结”。里布拉通过对美国起薪最高的三大行业——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校园招聘进行研究,揭示了为什么在“人人都能追逐美国梦”的美国社会中顺利通过招聘选拔、最终获得高薪职位的往往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

尽管学习和就业的结果通常被解释为个人抱负和能力,但里布拉却发现,通化有关部门在道歉之后的应对举措,与全体居民生活保障的现实需要之间仍有差距。

疫情防控导致居民物资断供太不应该

陈城

这几日,吉林通化小区封闭管理,部分市民遭遇生活物资配送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1月24日,通化市委副书记就此问题道歉;次日凌晨,通化市委书记赴一线检查生活物资配送情况。

此前媒体报道,不少通化市民反映,实行按户进行疫情管控后出现了“断粮断药”现象,有的家庭“一个苹果俩孩子吃3天”……很难想象,一个市区人口仅36万左右的地级市,在疫情期间竟然无法保障市区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以至于当地居民希望通过上热搜求得全国关注的方式来

解决问题。通化市上热搜的“希望”达成了,当地政府开始重视了,但这并不代表疫情防控中的相关问题全都就此解决了。从目前当地居民在人民日报相关微博下的评论留言来看,通化有关部门在道歉之后的应对举措,与全体居民生活保障的现实需要之间仍有差距。

疫情严重、小区封闭管理、物资断供,这样的情形不是第一次出现。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许多地方在疫情防控方面都曾面临物资断供的情景。在这些状况出现近一年之后,类似的问题仍然在发生,这

说明发生这些问题的地方,没有将其他地方出现过的类似问题当回事,更没有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如果吸取相关教训,并据此准备预案,居民物资断供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一座城市理应具备应急能力,来保障紧急情况下的全市居民生产生活。应当明确的是,这不仅是当下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更是城市自身自救自强的功能性要求。除了突发传染性疫病,每座城市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遭遇暴雨、山洪、内涝、断电、停水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无论城市大小,应急能力建设、应急

预案准备,本就是常态化工作内容。

秋冬本就是传染病高发期,更何况当下形势严峻,新冠病毒仍旧在扩散传播,疫情在全国各地随时可能出现。经过一年的疫情防控,各级政府即便没有经历疫情传播的情况,也应该从其他地方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借鉴有益经验,未雨绸缪。正是在此意义上,通化疫情防控中出现的物资断供情况,实属不该。

无论疫情是否结束,良好的城市应急能力都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

题中应有之义。当务之急是,各地政府应该从这一事件中观照自身是否存在类似不足,学会科学防疫,锻造完整防疫链条。除了应尽快形成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外,还有必要系统性地研判各地防疫措施是否能为己所用,并在合适时机,展开相应的疫情防控演练,确保疫情一旦发生,疫情防控不出差错。

光明时评
中国新闻奖专栏

对于被神话化的人工智能不必过度恐惧

夏莹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极为艰深而复杂的技术,近年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围观,而相关的讨论却较少涉及其技术原理,较多涉及的则是其给人自身以及人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一时间,人工智能威胁论伴随着各色科幻剧上演,生动地演绎着人与技术之间的对峙。不管是辩护还是批判,恐慌一直都是社会讨论的主基调。然而人工智能“洞悉细无声”的渗透却从未被公开讨论左右,它正变换成种种算法推送、虚拟社交、平台资本、比特币,改变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对人工智能的警觉和反思源于它“宣称”正在试图构造一种“人造”(artificial)的“理智”(intelligence),而这一“理智”被现代人引以为属人的智慧,为人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警觉与反思是必要的,任何技术的发展都需要某

种界限,以避免其破坏人类的伦理价值。但在对人工智能的反思和批判中,我们似乎过多地赋予了这一技术想象性内涵,将这一技术进步所完成的“深度学习”当成对人之独特属性的复制。以至于制造阿尔法狗的工程师们将自己创造的“技术”推进了另一个无法解释的“黑匣子”,让这一技术获得自身的能动性,仿佛它瞬间活了过来,可以如人一般自我教导、自我成长。人工智能自此走向了神坛,成为现代人自身再造的一个新的神话。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所有被人自身创造出的神话体系在前启蒙的时代都包含着以下两个功能:其一,将所有不能被解释的现象纳入人类固有的阐释框架之内;其二,消除人类面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于是我们拥有了诸如希腊罗马的神话体系、基督教的《圣经》、托马斯·莫尔的

《乌托邦》,以及在同时代层出不穷的科幻小说。奥林匹斯山诸神的设定,不过是人们在不知道风雷雨电的根本原因的时候对大自然的变化提供的一种可理解模式。《乌托邦》也是英国人莫尔无法容忍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剥削而为当时的人们构筑的一个美好愿景。同理,由人工智能所产生一整套话语体系,在这一意义上成为现代人再造的一个新的神话,一方面表达了人对于技术无限进步的质疑和恐惧,另一方面人们又借助对它的批判来捍卫人之为人的固有尊严。这一尊严不仅表现为我们应当能够掌控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同时还包括我们所创造的一切不应当入侵到属人的独特领地,诸如人的理智与情感。

应该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威胁论背后有一种预设:以“深度学习”为标志的算法革命,就是人的理智

甚至情感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但实际上,由于人工智能所实现的永远只是人类思维最为表层的知性思维的更新,它所彰显的总是一种更高、更快、更强的计算能力,其所依赖的也不过是对超大数据库的加工,最终实现的也只能是科学技术层面上的进步。而人类复杂的情感、意识之谜却从来都不在知性思维可理解的范围之内。正如我们虽然可以科学地安排一个行程,但却永远无法把控心血来潮所引发的情感冲动,更无法把控在这一情感冲动之下我们所有的行为。而正是后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真正诠释了人之本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人工智能作为现代人某种神话体系的再造,正在借用人们对它过多的想象重新诠释着一个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人之本质。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业绩考核要给“潜绩”留空间

陈朋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如事识人,重在考核。考核是“指挥棒”,是检验干部工作状态和能力水平的“试金石”。因此,它成为干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也被各级党委政府当作评优评奖、激励善为的重要手段。

岁末年初阶段,各地正在对上半年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及实际成效开展收官考核总结。从现实形态看,成绩既有能总结出来的“显绩”,也有仍在沉淀期的“潜绩”。无论是出于考核的易操作性、可量化和易于评估性,还是出于考核对象的心理预期,人们都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显绩”。在有些人看来,“显绩”既显山又露水,既能让上级领导直观地看到这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又能向辖区群众广泛宣传之这一年的所想所干。实际上,古往今来的历史

经验表明,考核既要重视“显绩”,也要重视“潜绩”。唯有实行双绩同考,才更为客观准确、公平公正。

之所以要给“潜绩”留空间,深层次看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也是讲求发展规律、注重高质量发展的体现,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淡、悟得出得失的体现。对于这种注重夯实基础、涵养潜力、积蓄力量,不给自己任掏空家底或者留下“烂摊子”的做法,就应该与那些可圈可点、显山又露水的“显绩”同等对待,甚至更高看一眼。

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也可能导致“显绩”不佳,需要从长计议:一个

地方的发展基础本身就比较薄弱,资源禀赋亦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其较短的时间内拿出轰轰烈烈的“显绩”,难免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还比如,一名干部刚到一个新岗位,难以迅速打开局面,无法创造令各方满意、可圈可点的“显绩”。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要坚持双绩同考,多给“潜绩”留空间。

当前有些地方在开展业绩考核时还存在重“显绩”轻“潜绩”,甚至忽视、无视“潜绩”的问题,没有辩证地评价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的实绩,片面地把看岗位、见效快、影响大的“显绩”作为重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些原本着眼根本但精力投入多、见效周期长的“潜绩”。这种有失偏颇的考核,不仅伤害了一些干部真心抓“潜绩”的担当精神,而且容易诱

发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等不良作风。因此,当前亟须学懂弄通政绩考核有关规定的精髓要义,健全完善干部考评机制,让“显绩”与“潜绩”都成为干部勇担当、敢作为的“强心剂”。

抓好“潜绩”考核要从多处着手。其中,摆在首位的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指标。考评指标的设计要体现政绩“虚”与“实”、“隐”与“显”、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已有基础与当下成果、现实成效与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从指标内容、标准细则、考核权重等关键层面入手,让考核对象不仅关注经济增长、自然生态保护等硬指标,而且关注人文环境营造、文化传承弘扬、政治生态优化等软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还要加

大社会发展的投入,进而推动整个考核体系更加全面、科学、合理。科学合理的考评指标能不能发挥积极作用,还同考核对象密切相关。因此,在考评指标确立以后,要选择务实管用的考核方法。比如,综合运用历史纵向对比、区域横向比较、内外环境同期分析等方法,仔细研判考核对象所做的抓眼前、求当下与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最大限度甄别工作中的“潜绩”。特别是要走好群众路线,秉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群众理念,深入“田间地头”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最大限度把那些暂时“不显山、不露水”“步子小”但是遵循发展规律、利长远的“潜绩”挖掘出来,并同等对待。唯此,才能让一个地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跑出持久力。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江苏省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

新闻随笔